

《铜政便览》研究^{*}

李明奎

内容提要:《铜政便览》是在《云南铜志》基础上修改完成的一部有关清代云南经济、货币和铜政的重要著作,其作者不可考,可能是由清代云南布政司幕僚编纂而成。关于该书的版本,今天常见的主要有两种,一为台湾学生书局影印的清嘉庆钞本,一为清光绪十三年(1887)刻本,所谓清道光刻本实难信从。该书与《云南铜志》《云南铜政全书》《滇南矿厂图略》等书记载之差异,亦足资后人考镜。

关键词:铜政便览 版本流传 比较研究

《铜政便览》是清代嘉道年间编纂的一部有关云南经济史、货币史和铜政史的志书,其作者不可考。光绪《续云南通志稿·艺文志》曾著录,对《铜政便览》的版本、内容作了完整介绍,并言其“叙次详晰,后来办理得有所依据”。^①后人对其研究,多集中在其版本的讨论上,然诸说纷纭,或主清道光刻本,或主清光绪刻本,令人难以适从。该书在篇章结构上与戴瑞徵《云南铜志》复多相同,更是令人费解。王德泰、强文学《〈铜政便览〉考辨》证明该书许多记载是正确的,为后人利用此书提供了保证,^②但对于其版本流传以及与《云南铜志》的关系未作探讨。魏明孔、魏正孔对《铜政便览》进行了标点校勘,推动了该书的研究,然对上述问题亦仅作了简要说明。^③成艳萍《点校本〈铜政便览〉简介》则以书讯形式对魏明孔、魏正孔整理的《铜政便览》进行了介绍。^④本文试图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对《铜政便览》的版本流传等相关问题作进一步分析,以推进学界对此书的研究和利用。

一、剪不断,理还乱:《铜政便览》版本考释

关于《铜政便览》的版本,诸书所记互有出入,今详考如下。

首先是清刻本。李小缘在《云南书目》中述及:“《铜政便览》8卷,……不著名氏,当是嘉道间布政司幕中所撰,原止钞本,光绪13年夏,路南知州陈先溶购得于市,布政使曾纪凤刊存藩署。”^⑤邓衍林云:“《铜政便览》八卷,清云南矿务局编,清光绪间刊本,六册”,^⑥指明此书的编者和刊印时间。方国瑜《云南史料目录概说》亦明确指出:“光绪十三年夏,路南知州陈先溶得《铜政便览》钞本,布政

[作者简介] 李明奎,云南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昆明,650091,邮箱:910794439@qq.com。

* 本文为云南大学笹川优秀青年教育基金资助项目“《铜政便览》整理研究”(批准号:14KT102)阶段性成果之一。

① 光绪《续云南通志稿》卷168《艺文志》,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影印本,第9898—9899页。按: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的光绪《续云南通志稿》,其卷首镌刻有“续云南通志稿一百九十四卷光绪二十四年刊于四川岳池县”,然据童振藻《云南方志考》等书研究,此书刊刻应在光绪二十七年,而非二十四年。参见童振藻《云南方志考》,中国西南文献丛书编委会主编《中国西南文献丛书》第3辑《西南史地文献》第3卷,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影印本,第36—37页。

② 《中国经济史研究》2007年第2期。

③ 魏明孔、魏正孔校注:《〈铜政便览〉点校本》,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3年版。

④ 《中国经济史研究》2014年第2期。

⑤ 李小缘编:《云南书目》,中国文献丛书指导委员会甘肃古籍文献整理编译中心、中国西南文献丛书编委会主编:《中国西南文献丛书·二编》第3辑《西南史地文献》第1卷,北京:学苑出版社2009年影印本,第207页。

⑥ 邓衍林编:《中国边疆图籍录》,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第245页。

使曾纪风排印之以广流传。”^①可见此书在光绪十三年之前以钞本行世,至布政使曾纪风之后方有刻印本,是则此书应为光绪刻本。其余如《中国地域文化》《新纂云南通志》《云南辞典》等均主清光绪刻本。^②另有部分学者主道光刻本,李友仁《云南地方文献概说》、张利主编《中国西部地区地方文献资源论稿》等均主此说。^③比较权威的《中国古籍总目》的相关记载较为完整:“《铜政便览》八卷,清道光刻本,藏云南省图书馆;清云南布政使司钞本,藏中科院;清钞本(存卷二至八),藏云南省图书馆。”^④据此,《中国古籍总目》亦主道光刻本。

此两种版本说没有统一意见。一些书籍对于《铜政便览》清刻本的记载,时主道光刻本,时持光绪刻本,令人难以适从。《云南省志·出版志》记载:“道光年间,由云南府署主持刻印过云南巡抚吴其浚(笔者注:应作吴其濬)撰的《滇南矿厂工器图略》。……此外,还刻了佚名撰的《铜政便览》8卷”“《铜政便览》八卷,清佚名撰,清道光间云南刻本。”^⑤据此,《云南省志·出版志》似主道光刻本。但是《云南省志·文化艺术志》载:“清代,云南从省到府、州、县都普修地方志,使‘致用之书,传世之作’倍增,而且科技文献的编纂印行也有很大的发展,如道光年间编印的《滇南矿厂工器图略》、《舆程图略》及清光绪年间刻印的《铜政便览》、《滇南本草》等”,^⑥似乎又主光绪刻本。特别是《云南省志·出版志》在显示“道光年间……,还刻了佚名撰的《铜政便览》8卷”之后,又载“光绪十三年(公元1887年),布政使司刻印《铜政便览》8卷”,^⑦给人《铜政便览》有道光和光绪两个刻本的认识。

要之,《铜政便览》并未著录于道光《云南通志稿》,而是记载于光绪《续云南通志稿》。据此,《铜政便览》的编纂刊印大体在道光十五年至光绪二十七年之间。并且,光绪《续云南通志稿》明确写到:“《铜政便览》八卷……不著名氏,当是嘉道间布政司幕中所撰。原止钞本,光绪十三年夏,路南知州陈先溶购得于市,布政使曾纪凤刊存藩署。”^⑧据此,该书编纂完成后,一直以钞本形式流传,直至光绪十三年,才由云南布政使曾纪凤出资刊刻。李小缘、方国瑜等学者的研究应是以此为据。《续云南通志稿》明确记载如此,不知何故,学界多把此书定为道光刻本。据笔者考察,似乎道光刻本的说法源于云南省图书馆的记载。今将云南省图书馆所藏《铜政便览》一书的检索信息列举如表1。

表1 云南省图书馆所藏《铜政便览》版本信息总目

【书目信息】		检索【铜政便览】命中约:4名记录 第1屏 10条/屏		上一屏 下一屏		图书馆
题名	责任者	出版项	页码	价格	索取号	详细信息
铜政便览:八卷		(不详):(不详),清中叶	6册		12/36	详细信息
铜政便览:八卷	(清)(不详)纂	:,清道光云南刻本	6册		滇甲 27/8712	详细信息
铜政便览:八卷	(清)(不详)纂	:,清	6册		滇甲 27/8712.1	详细信息
铜政便览:八卷	来源未注	不详,清:不详	6册		245.2/2	详细信息

① 方国瑜:《云南史料目录概说》,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730页。

② 参见蒋宝德、李鑫生主编《中国地域文化》,济南:山东美术出版社1997年版,第2534页;龙云等编纂,李春龙等点校《新纂云南通志》卷72《艺文考二》,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92页;《云南辞典》委员会编《云南辞典》,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52页。

③ 李友仁:《云南地方文献概说》,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2005年版,第171页;张利主编:《中国西部地区地方文献资源论稿》,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5页。

④ 中国古籍总目编纂委员会编:《中国古籍总目》史部第6册,北京: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3534页。

⑤ 云南省新闻出版局编:《云南省志》卷76《出版志》,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7、643页。

⑥ 云南省文化厅编:《云南省志》卷73《文化艺术志》,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788页。

⑦ 云南省新闻出版局编:《云南省志》卷76《出版志》,第57页。

⑧ 光绪《续云南通志稿》卷168《艺文志》,第9898—9899页。

表1显示,索取号为滇甲27/8712一栏明确注明清道光云南刻本。^①经查阅,此本共6册,卷1至卷4均单独成册,卷5、卷6为一册,卷7、卷8为一册,封面字迹完好。每页正文9行,行20字,小字双行同(每卷小序则9行,行19字),版心上有题(注明书名、卷数和页数),单鱼尾,无象鼻,双丝黑栏,字迹印刷清晰,但无序言跋尾,亦无刻书牌记。每册封面上有一浅蓝色印章,钤“云南省图书馆图书”。扉页上有3枚印章:一为浅蓝色,上钤“公历一九五二年贰月贰日接收李培天图书”;一为浅蓝色,上钤“云南省图书馆图书”;一为红色篆体,上钤“云南省图书馆”。卷1《厂地上》空白处有一红色篆体印章,上钤“云南省图书馆珍藏印”。卷3《京运》空白处有3枚印章:一为紫色,上钤“接收李培天图书”;一为浅蓝色,上钤“云南省图书馆图书”;一为红色篆体,上钤“云南省图书馆”。卷4《陆运》、卷5《局铸上》、卷7《采买》处3枚印章同卷3。此外,标明清中叶出版的《铜政便览》八卷(索取号:12/36)共6册,卷1至卷4均单独成册,卷5、卷6为一册,卷7、卷8为一册。每册封面有2枚印章:一为云南省昆华图书馆存印(红色),一为云南省图书馆图书印(紫色,繁体)。该本每页正文9行,行20字,小字双行同(每卷小序则9行,行19字),版心上有题(注明书名、卷数和页数),单鱼尾,无象鼻,双丝黑栏,字迹印刷清晰,但无序言跋尾,亦无刻书牌记,封面字迹较为残破。

经过详细比对,这两种刻本版式一样,用墨字迹相同,脱漏内容一致,书中未有明确刻书牌记和相关序跋以标示刊刻时间和地点,不知何故分为道光刻本和清中叶本。《续修四库全书》史部政书类第880册收录《铜政便览》,其扉页题词亦只有“据云南省图书馆藏清刻本影印,原书板框高一八三毫米,宽二五七毫米”一语,^②并无清道光刻本等字样。至于索取号“245.2/2”一栏标有八卷共6册,系统显示其专述清代云南省产铜之厂地、运输、铸造、采买等情况。但未能找到,具体情况不得而知。

因此,根据光绪《续云南通志稿》的记载和李小缘、方国瑜等学者的研究,本文认为《铜政便览》一书最早刊刻在光绪十三年,即光绪刻本,而道光刻本之说证据不足。

其次是清钞本。光绪《续云南通志稿》等书记载,《铜政便览》完成后,并未刻印,而是以钞本流传。《中国古籍总目》所记此书钞本有二:一为清云南布政使司钞本,藏中科院;一为清钞本(存卷2至卷8),藏云南省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中文古籍善本书目》载:“《铜政便览》八卷,清不著撰人,清云南布政使司抄本,六册一函。”^③据魏明孔、魏正孔研究,此钞本即台湾学生书局于1986年以《中国史学丛书三编》名义影印的嘉庆钞本。^④此本每页9行,行20字,小字双行同,版心上有题(注明书名、卷数和页数),上钤有北京大学图书馆、台湾“总统”府图书馆等藏书印。此手钞本字迹清晰,然书法一般,错别字较多,脱漏内容不少(大多与清刻本相同)。其编选影印缘由,据刘兆祐《〈铜政便览〉提要》云:“此书传本罕见,此本为清嘉庆间钞本,原藏国立中央图书馆台湾分馆,视‘国立中央’图书馆所藏另一钞本《云南铜志》(七卷)为详备,兹据以影印。”^⑤

所谓嘉庆钞本,笔者于现搜集的公私目录书籍和大陆学者的研究中,均少见提及,不知是真有所谓嘉庆钞本,因现在出版的目录书籍或学者所未见而漏载,还是《铜政便览》未有此钞本,仅属刘兆祐的误写。关于《铜政便览》的作者,王文韶等在编纂光绪《续云南通志稿》时已经不得而知,只言“不著名氏,当是嘉道间布政司幕中所撰”。其后,李小缘《云南书目》、严中平《清代云南铜政考》等书均同此说法。书中所记内容,下限至道光七年(1827),与所标嘉庆钞本形成矛盾。对此,魏明孔、魏正孔作出解释:“此系嘉庆钞本,而此处道光七年记载有误。其中后一种可能性从时代逻辑上讲是不通的。因为嘉庆钞本确系钞本,非后人刻印本,因此,我们可以做出一个推断:该钞本不会早于道光

① 凡带滇甲、滇乙等字样的,为云南省图书馆所藏的珍稀古籍和善本书目,其余为普通古籍。

② 《铜政便览》扉页题词,《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88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24页。

③ 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编:《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中文古籍善本书目》,北京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48页。

④ 魏明孔、魏正孔校注:《〈铜政便览〉点校本“序言”》,第4页。

⑤ 刘兆祐:《〈铜政便览〉提要》,刘兆祐主编:《中国史学丛书三编》,台北:学生书局1986年影印本,第1页。

七年。惟有如此,才有可能对道光七年以前譬如嘉庆年间及其以前的铜矿资料统计全面。”^①杨伟兵等亦认为“该书具体作者、板印时间不详,但从内容上看,应在道光七年(1827年)以后刊印”。^②因此,笔者实在怀疑《铜政便览》有所谓的嘉庆钞本,但是仔细阅读刘兆祐撰写的提要,又似有所依据。

该书的另一清钞本即云南省图书馆所藏清残钞本,其索取号应为“滇甲 27/8712.1”(云南省图书馆电脑查询系统误作“滇甲 27/8712.1”),原共 8 册,今只有 7 册(第 1 册遗失,云南省图书馆电脑查询系统显示 6 册,与实际情况不合)。此钞本封面题“铜政鼓铸”字样,正文又题“铜政便览”。在该本卷 2《厂地下》空白处有一红色篆体印章,上钤“云南省图书馆珍藏”,卷 5《局铸上》因受潮,部分内容残破不清。该钞本每页 9 行,行 16 字(间有 17 字者),小字双行夹注,每行 27 字(间有 25 字、29 字者),字迹清晰,书法优美,略显欧体风格。全书抄录以楷体为主,间有一二行书。

与清刻本、清嘉庆钞本相比,此残钞本在内容上有很大不同,其夺文、衍文和错简等情况较为严重。夺文有脱漏一二字者,有脱漏七八字至二十余字者,最显著的如卷 2《厂地下》脱漏鼎新厂、竜邑厂和者囊厂 3 厂 1 200 余字的内容,卷 7《采买》脱广西省于嘉庆九年以后采买之数和贵州省于雍正八年至乾隆五年采买之数,总计 300 余字。衍文者有衍二三字者,有衍一二句者。最著者如卷 4《陆运》“核减铜色”条后,衍入滇省铜厂办铜、云南局铸、东川旧局、东川新局、广西局和滇省各厂采办铜斤等条,计 1 400 余字,且记载与嘉庆钞本、清刻本以及戴瑞徵《云南铜志》诸书之详略互有不同。^③卷 8《杂款》“水洩工费”条,于大功厂处衍入“嗣节奉部驳大功厂办铜短缩,支销水洩银两岂能照三千两之数支销”等 70 余字。错简者,最显著的如卷 5《局铸上》“东川旧局”条,将嘉庆十五年五月该局十炉年铸钱及其用铜情况 300 余字错简入东川新局内。此残钞本与清刻本和嘉庆钞本的另一差异在于小字注文的处理。清刻本和嘉庆钞本的小字注文一致,而此残钞本自卷 3《京运》之后,便把清刻本和嘉庆钞本的许多小字注文写作正文大字,而在一些地方,又将其余两本的正文大字作小字注文处理;其他如地名、年代等具体记载亦与清刻本和嘉庆钞本不同,而与《云南铜志》较多一致。

因此,本文认为《铜政便览》原止钞本流传,至光绪十三年,始有刻本传世,即所谓光绪刻本。至于此书的钞本,原不止一个系统。台湾学生书局影印的所谓嘉庆钞本,与清刻本相比,行距格式一致,夺文亦多相同,惟传钞书写时,错别字较多,而清刻本可能由于排印时略作改正,错别字较少,但夺文讹误亦复存在。而云南省图书馆所藏残钞本,字迹工整,书法可观,然夺文、错简、脱漏等情况极为严重,且许多记载与清刻本、嘉庆钞本亦复有异,当是另一钞本系统。今将《铜政便览》一书所见版本信息制为表 2,以供参考。

表 2 所见《铜政便览》诸版本比较

版本	馆藏机构/出版机构	装帧形式	行格版式	讹脱衍错简	内容记载
清残钞本	云南省图书馆	每卷一册,共 8 册(今存七册)。封面题“铜政鼓铸”,正文题“铜政便览”。	每页 9 行,行 16 字(间有 17 字者),小字双行夹注,每行 27 字(间有 25 字、29 字者)。书法较为工整,略带欧体风格,以楷体为主,间有一二行书。无序跋。	脱漏、衍文、错简等较为严重。部分内容因受潮而导致残破,难以辨认。	内容记载与清刻本、清嘉庆钞本不尽相同,而与《云南铜志》较多一致。在小字注文的处理上,亦与清刻本、清嘉庆钞本大异。

① 魏明孔、魏正孔校注:《铜政便览》点校本“序言”,第 5 页。

② 杨伟兵:《云贵高原的土地利用与生态变迁(1659—1912)》,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342 页。

③ 譬如,该残钞本载:“又广西局于乾隆元年开设炉九十四座,……至乾隆五年,将炉裁撤,所用铜斤解京。于乾隆十六年,复设炉十五座。至三十五年八月,全行裁撤。于四十二年,复炉八座。至四十三年,减炉四座,只留四座。”(按:《铜政便览》清刻本、嘉庆钞本和《云南铜志》均云,乾隆四十四年三月,“减炉四座,酌留四座”。)

续表

版本	馆藏机构/出版机构	装帧形式	行格版式	讹误脱衍错简	内容记载
光绪刻本	云南省图书馆 上海古籍出版社曾影印出版	6册,卷1、2、3、4单独成册,卷5、6为一册,卷7、8为一册。	每页正文9行,行20字,小字双行同,版心上有题,单鱼尾,无象鼻,双丝黑栏,无序言跋尾。	存在部分内容脱漏和讹误的情况,错别字相对较少。 原书目录与正文亦多差异。	内容与清残钞本、清嘉庆钞本和《云南铜志》《云南铜政全书》《滇南矿厂图略》等书不尽相同。
嘉庆钞本	“国立中央”图书馆台湾分馆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图书馆 台湾学生书局曾影印出版	中国社科院所藏则为六册一函。台湾学生书局影印钞本共一册,书首有主编者撰写的《中国史学丛书三编出版说明》和《铜政便览提要》,并冠有新编目录。	每页9行,行20字,小字双行同(每卷小序则9行,行19字),版心上有题(注明书名、卷数和页数)。字迹清晰,但书法一般。	部分内容脱漏和讹误,错别字较多。亦有部分内容空缺。 原书目录与正文亦多差异。	内容与清残钞本、清刻本和《云南铜志》《云南铜政全书》《滇南矿厂图略》等书不尽相同。

二、似是而非:《铜政便览》与《云南铜志》的关系探究

《铜政便览》除了版本流传问题颇多纷扰外,亟待解决的问题便是其与戴瑞徵《云南铜志》的关系。两书在篇章结构、内容记载上极其相似,许多地方甚至相同。两书是同一本书,还是分别成书而各有先后?若是后者,到底孰先孰后?这些问题均困扰着研究者。

童振藻认为《铜政便览》是由刻印者在刻印《云南铜志》时所改的书名,即《铜政便览》与《云南铜志》实际上是一书。他说:“《云南铜志》八卷,清戴瑞徵编辑。有木刻本及传钞本,均六册。(自注:《云南通志稿·艺文志》、童氏《木砚斋书目》)……木砚斋所藏钞本系题为《云南铜志》,与《云南通志稿·艺文志》所载之书名相同,其后刻本乃改为《铜政便览》,且刻本亦未载撰人名氏,不知何故。”^①此为童先生一家之言,似乎有一定道理。因为两书在卷帙内容上大多相同,而且《铜政便览》又失作者姓名。方国瑜在《云南史料目录概说》中将《铜政便览》附于《云南铜志》之后,对其版本流传略作介绍,并对其与《云南铜志》的关系提出思考:“按《铜政便览》不署撰人姓名,取与戴瑞徵书相校,大都相同,而有增补纪事至道光四年。盖戴瑞徵之书原有抄本存藩库,后经修改,不著姓名。光绪间排印此书时,亦未考究,故缺作者姓名也。”可见方先生认为《铜政便览》是在《云南铜志》基础上修改而成,只因当时未著作者姓名,后人排印时,对此亦未详考而缺作者信息。^②梁晓强则认为《铜政便览》是在《云南铜志》基础上所作的后续之书。^③张增祺对于两书在卷数、目次上的相同,推测为“不知为偶合,或后者据前者增补、节录而成”,对于方国瑜的解释和光绪《续云南通志稿》的记载,张先生亦难以选择而将两种观点并存。^④魏明孔、魏正孔则认为该书是一部相对完整独立的文献资料,内容丰富,所记载时间跨度大,显然非一人、一地、一时之作。^⑤

目前,笔者所查阅到的最早对《铜政便览》进行完整记录的地方史志是由王文韶等编纂的光绪《续云南通志稿》,该书云:

《铜政便览》分六门,卷一卷二《厂地》,胪列厂之坐落、经费、程站,埒以开采年代、课价、经管、考成等;卷三《京运》,自限期以至滩次凡二十二条;卷四《陆运》,详载运行道路、店卡、支销凡

① 童振藻:《云南方志考》,中国西南文献丛书编委会主编:《中国西南文献丛书》第3辑《西南史地文献》第3卷,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影印本,第354页。

② 方国瑜:《云南史料目录概说》,第730页。

③ 梁晓强:《〈东川府志·东川府续志〉校注本》,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48页。

④ 张增祺:《云南冶金史》,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2000年版,第264—265页。

⑤ 魏明孔、魏正孔校注:《〈铜政便览〉点校本》“序言”,第1页。

一十五条;卷五卷六《局铸》,凡炉座增减、铸钱多寡、搭放兵饷、铸息赢绌,靡不备载;卷七《采买》,前七条始例限,终报销,后十条详记各省采买铜数;卷八《杂款》,凡动放工本、抽收税课以及接济水洩之需、官房工食之费,纤悉备具。铜政为滇中要务。咸丰军兴,各署册籍焚毁净尽,幸是编仅存,叙次详晰,后来办理得有所依据。^①

据此介绍可知,《铜政便览》是一部独立的、极有价值的著作,只是作者不得而知。遗憾的是,光绪《续云南通志稿》并没有对《铜政便览》与戴瑞徵《云南铜志》的关系进行说明。若考察两书关系,需先对戴瑞徵《云南铜志》进行必要的探究。

《云南铜志》曾载于道光《云南通志稿》,其云:“《云南铜志》八卷,戴瑞徵编。瑞徵字运章,号华峰,呈贡人。嘉庆间由议叙官高要县横查司巡检。是编分《厂地》上下二卷,《京运》一卷,《陆运》一卷,《局铸》上下二卷,《采买》一卷,《志馀》一卷。蒙化张登瀛序称历任方伯聘瑞徵勸铜政几三十年,以亲历周知、信今传后者勒为一编,在官为考绩之书,在幕为佐治之典,洵经纬精华之提要也。”^②方国瑜《云南史料目录概说》云:“书中所记止于嘉庆年事,即为嘉庆间所作而未刊者。”^③张增祺《云南冶金史》所考相同,并据戴瑞徵之子戴淳《晚翠轩诗续抄》卷5所载“先人所遗编,毕列五金利。尚冀赐采择,庶用付书记。十年篋笥中,几经孤儿泪”之句,云“道光六年,戴瑞徵《云南铜志》尚未刊印,故其子戴淳为刊刻之事四处求人,至今亦未听说有刻印本流传于世。”^④从以上学者的研究可知,戴瑞徵《云南铜志》成于嘉庆末年,至道光六年仍未刊印传世,只是被载入阮元所修道光《云南通志稿》中。今云南省图书馆藏有戴氏稿本的传钞本,书末有跋曰:“光绪纪元,偶于戴府见此书,嘉其赅备,肆无刻本,因假归,命学徒抄存一册,原稿仍归戴氏。香圃记。”字旁钤有华丁印和香圃2枚印章。

从上可知,戴瑞徵《云南铜志》原只有戴氏手稿本,光绪初年方有传钞本。此传钞本今藏于云南省图书馆,属于馆藏善本书目之一。云南大学历史系曾对此传钞本进行二次传钞。潘先林以此二次传钞本《云南铜志》为底本,进行标点校勘,收入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12卷,进行刊印流传。今将《铜政便览》与《云南铜志》进行比较,其卷帙均8卷,惟《铜政便览》记载远较《云南铜志》简略。以两书卷1所记之小序略作说明。《云南铜志》卷1“序”曰:

滇之产铜,由来久矣!俞元怀山、来唯从□山见于《汉书》。自蒙、段据窃以来,皆无可考。元明产铜之所,曰中庆、金齿、临安、曲靖、潞江数处而已。我朝三迤郡县,所在多有。宝藏之兴,超轶代,而铜亦遂为滇之要政。按滇省每年额运京铜六百三十余万斤,本省局铸、外省采买共需铜千余万斤。向有四十八厂,每年办铜一千一、二、三百万斤。拨用之外,馀铜运存泸店,以为备贮底铜。迨各厂开采年久,矿砂衰竭,以次封闭十馀厂。现在开采之厂只三十八处,其中又有酌减额铜者三,尽办铜九百二三十万斤。除通商之外,一年所获,实不敷用。赖有底铜存剩,并嘉庆十三四两年间,路南各厂办铜丰旺,京运、局铸、采买三者均无贻误。其三十八厂内,惟宁台、得宝、大功、香树、双龙、汤丹、碌碌、大水、茂麓、乐马、梅子沱、人老山、箭竹塘、长发、小岩等十五厂,专供京运。凤凰、红石岩、大兴、红坡、发古、大风、紫牛、青龙等八厂,兼拨京运、局铸、采买。其回龙、白羊、马龙、寨子箐、秀春、义都、万宝、大宝、大美、狮子尾、绿砬砬、鼎新、竜邑、者囊等十四厂,又宁台、香树二厂之紫板铜,专供局铸、采买之用。而金钗一厂,低铜则专拨采买。此各厂产铜、供运之大略也。志厂地。^⑤

《铜政便览》卷1“序”曰:

① 光绪《续云南通志稿》卷168《艺文志》,第9898—9899页。

② 道光《云南通志稿》卷192《艺文志》,道光十五年刻本。

③ 方国瑜:《云南史料目录概说》,第730页。

④ 张增祺:《云南冶金史》,第264—265页。

⑤ 《云南铜志》卷1“序”,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12卷,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17页。此处的标点断句与原书略有不同。

滇之产铜,由来久矣!怀、陞见于《汉书》,装、采著于《后汉》。自蒙、段窃据以来,划江为界,皆无可考。元明产铜之所,仅金齿、临安、曲靖、濛江四处。我朝三迤郡县,所在多有。宝藏之兴,轶于往代,而铜亦遂为滇之要政。按:滇省年运京铜六百三十余万,局铸、采买又需千万。向有四十八厂,以次封闭。现在开采者三十八处:宁台十五厂,专供京运;凤凰八厂,兼拔京运、局铸、采买;回龙十四厂及宁台、香树二厂之紫板铜,专供局铸、采买;金钗厂低铜,专拔采买;此各厂产铜供应之大略也。爰列其坐落、经费、程站,而以开减、经管、考成附焉。^①

两相比较,《铜政便览》于滇产铜之历史记载,除去前汉益州郡之俞元怀山、来唯从陞山外,又增后汉时装、采二山。所谓“装、采著于《后汉》”,乃指《后汉书·郡国志》记载的益州郡“俞元县装山出铜,赍古采山出铜锡”而言。《铜政便览》于元明云南产铜之所只计算4处,无中庆一地,于清朝当时开办的38厂,亦未一一详载其名,所载均较《云南铜志》简略。两书在具体内容记载、章节标题的安排上亦有不同。《铜政便览》于卷1《厂地上》“宁台厂”条下增补该厂于嘉庆十九年(1814)和道光七年办得宝坪铜厂办铜之事,又于宁台厂“子厂”条下增补进道光三年、四年所开采的钱麻岭厂和罗汉山厂内容。卷3《京运》“起剥僱纤”一条,《铜政便览》正文已经包含僱纤处所的内容,《云南铜志》则于该条之下又列“僱纤处所”一条,将其独立作为一节。卷4《陆运》中,《铜政便览》于“厂地搭运”“各店搭运”之间增补“委管泸店”一条,《云南铜志》则无此条;而该卷“寻甸路”一条,《铜政便览》已包含下关铜店的内容,未单独作为一节,《云南铜志》则独列“下关铜店”一条。卷5《局铸上》于“东川旧局”条下,《铜政便览》有嘉庆十五年局铸的内容,而《云南铜志》则无。卷7《采买》“借支运脚”一条,《云南铜志》已将该内容并于前条“寄存运脚”之内,未再标举“借支运脚”之名目。卷8之标题,《云南铜志》作“志余”,《铜政便览》则作“杂款”,并该卷“修理官房道路”一条,《云南铜志》将其析作“修建官房”和“修理道路”两条。综合两书对具体条目章节的安排,感觉《铜政便览》较为合理。

除以上区别外,《铜政便览》由于原止钞本流传,故其中多有文字脱漏。如所谓嘉庆钞本于卷1《厂地上》“宁台厂”条脱小标题“子厂”,“得宝坪厂”条程站处脱“平得村”一站,“大水沟厂”条于经费处脱“乾隆三十三年,每百斤加银六钱,连原价每百斤共给银八两一钱五分一厘”等内容。卷2《厂地下》“狮子尾厂”条于程站处脱“马路塘”一站,“办铜考成”条脱“七分者,降三级调用”数字。卷3《京运》“运员限期”条脱“在仪徵换船换篓过载限三十日”,“滩次”条于江西省彭泽县下脱“金刚料、小孤汛、小孤矶、马当矶”四地,于星子县下脱“青山、蓼花池、左蠡、将军庙、南关州”五地。卷7《采买》于“湖南省嘉庆七年、九年”条处有脱漏,于“陕西省”条脱“乾隆三十二年,委员采买高铜四十万斤”等十数字。卷8《杂款》“铜息银两”条于小字注文脱“每正高铜百斤收价银一十一两;正低铜百斤收价银九两”,致使文意难晓(清刻本的脱漏情况同所谓嘉庆钞本)。云南省图书馆所藏清钞本脱漏更是严重,有脱漏数十字至数百字甚至上千字者,其余如错简衍文等情况亦很多(见前文)。

以上关于《铜政便览》和《云南铜志》在内容记载、篇章安排等方面的比较,均是其差别较大之处。除却这些差别,两书只在某些方面的具体文字记载上略有不同(参见表3)。通过比较分析,本文试对两书关系阐述如下:戴瑞徵《云南铜志》于嘉庆末年成书,后一直没有刊刻,存于藩署。至道光年间,云南布政使司的幕僚于藩署中见此书记载详备,于云南铜政极有参考价值,便进行抄写以广流传。在抄录过程中,可能感觉戴书过于细致繁琐,便参考相关资料,对戴书内容进行修剪,文字也做了一些润饰,并适当增补道光年间的相关事迹。这样,修改过的书与《云南铜志》相比,虽然文字减少,但大体内容一致,记载亦较为精粹简洁,颇便观览,便命名为《铜政便览》。至于《铜政便览》中的脱漏情

^① 《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880册,第229页。

况,可能亦是在抄录修改《云南铜志》时造成。该书修改完成后,亦以钞本行世,直至光绪十三年方有刻本流传。

表3 《云南铜志》与《铜政便览》之比较

书名	作者	成书时间	版本流传	行格版式	脱衍讹误	卷帙篇章
云南铜志	戴瑞徵(云南呈贡人)	清嘉庆末	戴氏手稿本; 传钞戴氏稿本; 《云南史料丛刊》本等。	传钞戴氏稿本每页12行,行23字。无边栏,无书耳,版心上无题。书首有张登瀛序,书尾有跋。	传钞戴氏稿本脱衍讹误较少;《云南史料丛刊》本则有一二脱文和错简等情况,所记与传钞戴氏稿本亦有不同。	8卷。卷1《厂地上》,卷2《厂地下》,卷3《京运》,卷4《陆运》,卷5《局铸上》,卷6《局铸下》,卷7《采买》,卷8《志余》。
铜政便览	不详,可能是嘉庆道光年间云南布政使司幕僚中人所纂。	从内容上看可能在清道光七年左右成书。	清残钞本; 清云南布政使司钞本(即所谓的嘉庆钞本); 光绪刻本; 道光刻本(此说难以信从)。	清刻本每页正文9行,行20字,小字双行同,(每卷小序则9行,行19字)版心上有题,单鱼尾,无象鼻,双丝黑栏,字迹印刷清晰,但无序言跋尾,亦无刻书牌记。	清钞本和清刻本脱衍衍文等较多,惟清刻本错别字相对清钞本要少。	8卷。卷1《厂地上》,卷2《厂地下》,卷3《京运》,卷4《陆运》,卷5《局铸上》,卷6《局铸下》,卷7《采买》,卷8《杂款》。

《新纂云南通志》和《云南辞典》等则将《铜政便览》命名为《云南铜政便览》,虽与原书书名有所差异,然在所述《铜政便览》与《云南铜志》的关系以及《铜政便览》名字的由来方面,则较为合理。《新纂云南通志》云:“《云南铜政便览》,是编不载纂辑人姓名,体例、门类仍依戴瑞徵《云南铜志》,惟翦裁删削,去其繁文,故以‘便览’名,并将道光以后关于云南铜政逐目附入。光绪间槧行。”^①《云南辞典》亦云:“《云南铜政便览》,不署撰人姓氏,书为戴瑞徵撰《云南铜志》之简编,并补入道光以后事。光绪间刻行,云南省图书馆有原刊本。”^②

三、他山之石:《铜政便览》与相关同类书籍的比较

在乾隆年间,云南已有记载冶炼技术和厂矿生产的专著。至光绪年间,各种冶金著作多达十余种,近一百余卷。其中较重要的有余庆长《铜政考》80卷、王昶《云南铜政全书》50卷、戴瑞徵《云南铜志》8卷、佚名《铜政便览》8卷、吴其濬《滇南矿厂图略》2卷和檀萃《茂隆厂记》等。然而,《铜政考》在嘉庆年间已经失传,其内容难得而详。《云南铜政全书》是一部重要的有关清代云南铜政的书,惜原稿已失,只在王昶《春融堂集》保留一篇编写《云南铜政全书》的凡例文章,在道光《云南通志稿》卷73至卷78存有部分内容,吉光片羽,弥足珍贵。《茂隆厂记》主要记述石屏人吴尚贤在今沧源县班洪地区与佤族头人蜂筑开办银厂之事。今日尚能完整看到的清代云南铜政书籍,除《云南铜志》和《铜政便览》外,《滇南矿厂图略》便是重要的一部。

《滇南矿厂图略》是吴其濬任云南巡抚时期所撰,由东川知府徐金生绘图,分上、下两卷。上卷题《云南矿厂工器图略》,卷首详载工器图20幅,正文记述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四朝云南南部开采铜、锡、金、银、铁、铅等矿产的分布、矿冶技术和管理制度等。下卷题《滇南矿厂輿程图略》,卷首载云南省各府州矿厂分布和运输途程图21幅,正文对清代云南铜、银、金、锡、铅、铁等矿厂的分布、沿革、课税以及运输线路和费用等予以全面介绍。该书版本比较多,有道光二十四年刻本、北京大学藏本、法

① 龙云等编纂:《新纂云南通志》卷72《艺文考二》,第292页。

② 《云南辞典》委员会编:《云南辞典》,第552页。

译本、《续修四库全书》本等十余种。^①

经过几种书籍的研读比较,发现《铜政便览》不仅记载内容相对《云南铜志》更简洁,而且与《云南铜政全书》《滇南矿厂图略》《道光云南志钞》以及道光《云南通志稿》等书相比,也略有不同。如江西省于乾隆七年(1742)采买铜数,道光《云南通志稿》先引《文献通考》作“五十馀万斤”,随后附按语云“寻截留五十五万馀斤”,^②与《铜政便览》《云南铜志》所记“五十四万九千五百四斤,每百斤加馀铜一斤,运回江省供铸”有异。^③广东省于乾隆十二年采买滇铜之数,《云南铜政全书》作“十二年,广东巡抚准泰请买滇铜四十万斤。经云贵总督张允随于剥隘贮铜一百万斤内拨铜二十四万斤,金钗、红坡厂拨铜十五万斤”,^④则该省于乾隆十二年采买滇铜之数为39万斤,与《铜政便览》所记之数略有不同。^⑤又如东川旧局于雍正十二年(1734)九月设炉28座鼓铸,其每炉每卯带铸用铜共51斤6两8钱5分7厘1毫,按每百斤加耗铜8斤计算,则所加耗铜应为4斤1两8钱2分8厘5毫零,《云南铜志》则作“计加耗铜四十一两八钱二分八厘五毫零”,^⑥前后核算,当以《铜政便览》所记为是。滇铜水运进京,沿途所经之地名,诸书所记也略有差异。如自罗星渡水运泸店京铜,所经各滩,据《铜政便览》《云南铜志》所记有鱼脊梁滩、火井坑滩、木僮滩,《滇南矿厂图略》则作“鱼脊滩”“大井坑滩”,并把木僮滩分为“木滩”“僮滩”。而于四川巫山县所经之空望沱滩,《云南铜志》作“空望滩”,《钦定户部则例》《滇南矿厂图略》则作“空房滩”。

此外,关于各厂开采时间、名称由来等内容,《铜政便览》不仅简略,且与《云南铜政全书》、道光《云南通志稿》和《滇南矿厂图略》等书略有不同。如汤丹厂开采时间,《铜政便览》只云该厂原系四川经管,雍正四年改归云南采办,具体开采年份未详,而道光《云南通志稿》先引《旧云南通志》云:“汤丹厂……雍正四年,总督鄂尔泰题开”,然后又引《云南铜政全书》云:“汤丹厂……东川初隶四川,厂已开采,雍正四年改隶云南,岁获铜数无考”,并详细记载汤丹厂在雍正、乾隆时期开采铜斤之数。^⑦据此,汤丹厂在明时已经开采。《滇南矿厂图略》亦云汤丹厂“前明时开,乾隆初获铜极盛”。^⑧至于其子厂观音山厂的开采年份,《铜政便览》《云南铜志》均云于乾隆二十年开采,^⑨《云南铜政全书》《滇南矿厂图略》则云于乾隆二十三年开采。^⑩红坡厂,据《铜政便览》《云南铜志》所云,于乾隆三十五年开采,^⑪《云南铜政全书》等则将其提前10年,作“乾隆二十五年开采”。^⑫此种差异,全书不胜枚举。关于红石岩厂坐落情况及历史演变,《铜政便览》《云南铜志》云:“红石岩厂坐落路南州地方,距省三站,乾隆六年开采。”^⑬然《云南铜政全书》则云:“红石岩厂在路南州东六十里,明时于附近之暮卜山开采,年获铜数百万斤。万历年重修西岳庙碑,犹记其略。今厂在暮卜山之旁,名龙宝厂,

① 关于《滇南矿厂图略》的版本,参见陈海连、高瑄《从滇南矿厂图略看清代云南铸币铜矿的运输问题》,《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7年第6期。

② 道光《云南通志稿》卷77《食货志》,道光十五年刻本。

③ 参见《铜政便览》卷7,《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880册,第340页;《云南铜志》卷7,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12卷,第808页。

④ [清]王昶:《云南铜政全书》,转引自道光《云南通志稿》卷77《食货志》,道光十五年刻本。

⑤ 《铜政便览》卷7(《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880册,第346页)记载:乾隆“十二年,委员采买高铜二十四万九千九百斤,每百斤加耗铜五斤,余铜一斤;又买低铜十五万九千九百斤。”

⑥ 《云南铜志》卷5,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12卷,第788页。

⑦ 道光《云南通志稿》卷74《食货志》,道光十五年刻本。

⑧ [清]吴其濬:《滇南矿厂图略》卷2,《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88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75页。

⑨ 《铜政便览》卷1,《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880册,第236页;《云南铜志》卷1,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12卷,第723页。

⑩ 王昶:《云南铜政全书》,转引自道光《云南通志稿》卷74《食货志》,道光十五年刻本;吴其濬:《滇南矿厂图略》卷2,《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880册,第175页。

⑪ 《铜政便览》卷2,《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880册,第249页;《云南铜志》卷2,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12卷,第734页。

⑫ 王昶:《云南铜政全书》,转引自道光《云南通志稿》卷75《食货志》,道光十五年刻本。

⑬ 《铜政便览》卷2,《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880册,第247页;《云南铜志》卷2,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12卷,第733页。

省志载龙宝厂坐落路南州地方是也。康熙四十四年(1705),总督贝和诺疏称按厂抽课,犹有其名。后封闭,乾隆六年复开,始名红石岩厂。”^①《滇南矿厂图略》亦云“红石岩厂在路南东六十里暮卜山之旁,旧名龙宝厂,路南州知州理之。乾隆六年复开,改今名”。^②通过后两书记载,读者对红石岩厂的厂址、厂名变化、开采历史等有一大致了解。发古厂亦是如此,《铜政便览》云:“发古厂坐落寻甸州地方,距省六站,乾隆三十六年开采。”^③综合《滇南矿厂图略》《云南铜政全书》方知,发古厂原属曲靖府寻甸州管理,名教厂坝发古山,又名桅木旱山。乾隆三十七年开采,因离路南较近,在乾隆四十二年便划归路南州。

相较而言,对于各厂的厂名由来、历史沿革等,《铜政便览》不若《云南铜政全书》《滇南矿厂图略》等书详细,对于云南各地因办铜形成的相关忌讳、风俗等亦未记载,读者若要搜集这些信息,需关注吴其濬、王昶等书。另外,《铜政便览》主要记载清代云南铜矿开采、运输和鼓铸等问题,而《滇南矿厂图略》不仅记载了清代云南33个铜矿的开采、运输状况,对于其他矿产诸如锡、铁、铝等亦作记载,是一部介绍清代云南矿冶业的综合性著作。即便如此,《铜政便览》仍然有其参考价值。刘兆祐曾云:“清代铜政之有关资料,大致备于是编,足为研究清代经济史者之考镜也。”^④魏明孔、魏正孔特别指出《铜政便览》为研究清代云南地区乃至全国的铜矿的开采、运输、冶炼、价格、人工报酬、管理等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故而对其进行整理。^⑤王德泰、强学文亦认为《铜政便览》是研究清代云南铜政、货币史的第一手资料。^⑥总之,《铜政便览》记载了清代云南开办铜厂、滇铜运京、各省采买铜斤以及云南铸钱等基本情况,所记较戴瑞徵《云南铜志》更为简洁,颇便观览,且史料价值极高。其与《云南铜政全书》《滇南矿厂图略》等书记载的不同之处,亦足资后人考镜。

The Study of *Tongzhengbianlan*

Li Mingkui

Abstract: *Tongzhengbianlan* is an important book related to economic, monetary and copper political of Yunnan in the Qing Dynasty. It is difficult for us to know its author, which should be modified by the staff of Yunnan Provincial Administrative Government and based on the book *YunNantongzhi* written by Dai Ruizheng. There are two main transcripts that we can see today, one is so-called Qing JiaQing Dynasty version, which comes from Taiwan Student Publishing House; the other one is Qing GuangXu Dynasty version, which enshrined in the library of Yunnan province, it is a block-printed edition. There are many differences in the format and content in two editions; while so-called the Qing DaoGuang edition is really difficult to be convinced. Some records in *Tongzhengbianlan* are different from *YunNantongzhi*, *YunNantongzhengquanshu*, *DianNankuangchangTulue*, and so on. But general contents are correct and reliable, so it is sufficiently worth consulting for the researchers.

Key Words: *Tongzhengbianlan*; Version Circulated; Comparative Study

(责任编辑:丰若非)

① 王昶:《云南铜政全书》,转引自道光《云南通志稿》卷75《食货志》,道光十五年刻本。

② 吴其濬:《滇南矿厂图略》卷2,《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880册,第177页。

③ 《铜政便览》卷2,《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880册,第250页;《云南铜志》卷2,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12卷,第735页。

④ 刘兆祐:《〈铜政便览〉提要》,刘兆祐主编:《中国史学丛书三编》,第1页。

⑤ 魏明孔、魏正孔校注:《〈铜政便览〉点校本》“序言”,第1—7页。

⑥ 《〈铜政便览〉考辨》,《中国经济史研究》2007年第2期。